

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Ecologic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陈敏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所, 研究员 上海 200020)

看看今日的世界,那些最荒凉、最衰落、最困苦的地区,大多是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曾经是世上最繁荣、最昌盛、最富裕的地区。曾经或现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族,也大多是在文明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曾经创造过辉煌业绩的人民。历史早期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的大多数是贫瘠、干涸、令人悲凉的荒漠。文明发展史上那些最光辉灿烂的成就,几乎都导致了奠定文明基础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自然资源加速枯竭。享受文明成果最多的现代人的列祖列宗从来不曾像他们今日的子孙这样骄傲自豪,可是,往日的世界也从来不曾像今日的世界这样岌岌可危,急需拯救。

这历史的与现实的荒诞推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每一代人(特别是其中的决策者)究竟应当怎样衡量自己创造的文明成就,又应当如何评价自己决策与行为的功过得失?

关键在于价值。价值是决策的灵魂。

通常情况下,解决意见分歧的困难,往往并不在于科学实际和技术过程的精确性本身,而在于对价值和利益判识的差别。价值取舍是文明发展的方向盘,也是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认识基础。实利主义哲学的长期盛行,使人类习惯于用单一性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作为决策的基石。古今中外,错误决策大多产生于价值的误判误导,种种错误决策实施后果的积累,终于堆砌成当今人类身临其中的困境。可以说,当代世界的一切危机,本质上都是价值的危机。

历代,特别是产业革命以来,传统价值观的致命伤就在于实际上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甚至无视经济发展永远不可能摆脱其制约的生态背景,把经济活动孤立起来,企图在这个非线性运作的生态世界里实现永久的经济线性增长。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杠杆和文明发展的最高目的,其他目的(无论口头上喊得多响)都沦为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东西。经济增长这个最高目的的合理性是无须证明的,而其它一切价值

都得按照他们对实现最高目的所起作用的大小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当代世界价值危机的特征表现为人们观念中的价值缺损,而缺损最严重的部分就是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是文明发展的一根极其重要的价值杠杆,但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往往对之在口头上予以承认,而在行动上则加以排斥。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线性增长这一令人忧伤的世界性后果,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己也因与日俱增的占有欲、消耗欲而导致了自身的贫乏和异化,人类文明能否持续发展下去的巨大历史问号也正是从这里凸现出来的。

生态文化是一种关乎人类如何才能持续生存发展的文化。它提示人类社会必须重建价值观,要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继续沿用传统的单一性价值尺度作为决策的基础。这种文化必将向文明发展的所有领域广泛渗透,深深融入人们的决策思想和发展战略,并转化为一系列可以操作的政策、方案与措施。对这种文化的悟性和修养将成为人的素质与品位的重要标志,渗透在亿万世界公众的价值观念、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中,并成为未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天空里的北斗星。只有这样,当前流行于人们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内涵深刻的思想,才能免于沦为庸俗的口头禅和各国政治与经济策略的廉价包装。

生态文化在许多国家正走向社会化,而一些学科和许多产业也在日趋生态化。今后,它必将持续地以不断刷新的面貌迅速向前发展,人们也将以不断更新的眼光对它刮目相看。这一方兴未艾形势的兴起不是任何个人、集团或派别的意愿,而是人类渴望摆脱盲目性和自身困境的必然,是人类对未来作出整体的最优化选择的必然。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生态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全球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科技界以及世界公众心目中得到了普遍的确认(虽然有些人仅仅是口头上的),生态

^{*} 编者注:本文原系作者应上海发展所所长朱荣林所求,对其本人《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一书要旨所作的述介,本刊特摘要发表。

观已经永久性地熔铸到发展的概念中,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再将二者肢解开来了。

然而,生态文化认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的契机、方案和办法不可能产生于某种单一的理论、学科或文化,而只能得之于多种理论、学科的协同谐振,以及多种文化、思想的融汇互补。生态文化并不排斥或取消其他文化,但也不是其他文化所能排斥或取消的。新兴的生态文化固然不能单独照亮人类的未来,然而,缺少了这一盏明灯,要想越过横在人类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和陷阱也是难以想象的。

对新文明、新世纪的来临,人们总是以一种敬畏、神往、疑虑而又怀有希望的复杂心情去迎接的。著名的系统哲学家、钢琴家、美籍匈牙利裔学者拉兹洛以《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为题撰文写道:“过了当前这段杂乱无章的过渡时期,人类渴望进入一个更公平、更具有承受力的时代,那时,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作用,在我们为达到这一新时代而努力的过程中……生态观念必将成为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只要我们没有先毁灭自己,人类生态

学时代的文明将在 21 世纪逐渐放出异彩。”

目前这个时期是杂乱无章的。但这正是世界酝酿着进行深刻社会变革的边缘时期。这一次变革无疑会使人类文明升华到一个更加清明高远的境界,人性的水平也必将随之来一次大跨度的飞跃。前进的途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争端、歧见、危机,甚至动乱和流血。应当相信,这一切将不会再一次导致人类的迷惘和沉沦,而只不过是同一种崭新文明的诞生相伴随的阵痛和痉挛。

正是对以上这样一些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的思索,以及由之而产生和形成的种种认识,促进了拙著《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一书的撰写和面世。

从现在起,人类应当而且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悟性:在开发自然、变革社会、推进文明的过程中,经常反思内省,不断自我调控,使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不超越客观上所能承受的限度,保持人类社会内部环境各种关系间的协调,也保持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同自然界之间的协调。这就是生态文化的真谛,也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时下广泛流行的口号的真正内涵。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21 页)

变异则更容易。然而,在利用特定的生物技术对受体进行改良和改造中已经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目的基因已经进入受体的遗传组成中,但目的基因所控制的性状只是在部分个体中表达或很难表达或完全不表达。这将涉及到目的基因在受体的遗传背景中定点整合、转录和翻译水平,在 RNA 的稳定性、目的基因的时空表达及其调控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寻找到更适合的方法来提高外源基因在受体中的表达水平,进而提高转基因的效果。

3. 寻找和创造新的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是农作物育种的物质基础。没有优异的种质资源则很难培育出优良的新品种;缺少特异的目的基因则生物技术在农作物育种中也很难开创新局面。在农业生物技术育种中基因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其育种效果的好坏。因而,进一步寻找和创造出更多具有特殊价值的种质资源将是今后作物生物技术育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根据农作物的亲缘关系,在野生的近缘植物中寻找具有特殊价值的种质后再通过生物技术将其转入到栽培作物中,由此创造出新的可以被直接利用的种质资源将是今后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的非常重要的方面。除此之外,对同一物种在不同染色体组倍性条件下其特征特性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倍性水平与特定基因表达的关系进行研究则有可能挖掘

出某些潜在的基因资源。

4. 研究应该与产业密切配合

我国目前已具备了深入开展作物生物技术育种的技术基础,在某些方面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我国在作物生物技术育种方面研究与产业脱节现象比较严重,许多研究成果很难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例如,我国在 90 年代初率先在世界上成功地获得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的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然而,第一株转基因的玉米却首先在国外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这说明我国在产业化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将生物技术确定为 21 世纪的关键技术并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以此来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将作为生物技术的“第二次浪潮”在下一个世纪全面展开,这将给农业生产带来新的飞跃。当今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就是进一步阐明生物体基因组及其编码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作物生物技术育种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研究重点就是研究与农作物产量、品质和抗性有关的基因结构、功能及其应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物体内部的许多奥秘将被揭开,生物体生长发育和繁殖的一些机理将被掌握。

(责任编辑 肖庆山)